



不朽的冠冕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出版緣起

陳映真

一、「戰已勝而和平未致」

偉大的物理學家亞伯·愛因斯坦，在他的一篇題爲「戰已勝而和平未致」的文章中，沉痛地檢視了處在充滿着戰爭結構中的科學家的處境。他以深受「沉重的責任心」和「負罪感」所困擾之心，寫下當年爲了使全世界免於被瘋狂而凶殘的納粹所屠殺和奴役，他和別的一些科學家，將原子武器的秘密，連同全世界億萬人類的命運，託付給他們曾信以爲是「和平自由的鬥士」的兩個國家。但戰爭結束，和平却依然遙遠。愛因斯坦寫道：

然而，不幸的是，一直到今天，我們看不見任何和平的保障。我們看不見「大西洋憲章」對各民族所應許的自由，有什麼保障。戰爭已勝，而和平未致。強國在戰爭上團結一致，但在處置和平時却各行其是。人類也曾得到過能免於恐懼之自由的承諾。但是，事實上，終戰以來，人類的恐懼却有增無減。有人也曾經許諾過人類可以免於匱乏的自由。但是，當世界上絕大部份的地帶上，都面對着饑饉時，而另外一些別的地區

却富奢有餘。有一些民族和人民也曾得到過解放與正義的諾言。但是我們已經見證過，甚至到目前，仍然可以親自目睹到這悲慘的景象：所謂「解放」的軍隊，正在向着渴望着獨立和社會正義的人民開槍……。

在一百多年前，阿弗列德·諾貝爾發現了截至當時全世界最具威力——和殺傷力——的爆炸劑，乍成巨富。沒過多久，這種當時最巨大的毀滅力量，被用來產製強力的殺人的武器。沉重的自疚和負罪之心，使他在遺言中捐出巨資，設立了諾貝爾獎金。其中重要的一項，便是「諾貝爾文學獎」。每年一次，委託瑞典學院，頒給「不論其國籍，但求對全人類有偉大貢獻，且具有理想主義傾向的傑出文學作家」。

然而，在這八十年間，人類却經歷了兩次世界規模的戰爭。第二次大戰以後，又經歷了生命、財產、物質、金錢的損失數倍於兩次大戰的地區性戰爭。人類心靈的、物質的、文化的——以及人的損害，都是無從估計的。儘管如此，就在韓戰的前夕，愛因斯坦有這樣的祈禱：

「但願那激發諾貝爾創設獎金的崇高精神；

那相信自己也信賴他人的胸懷；那慷慨、正義、愛和四海同胞的信念，能在那些掌握人類命運者的心中，發生有力的影響……」

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中，人類似乎祇有一小部份的人，爲了描畫並且實踐一些美善之夢，爲了仰望並追逐高懸天邊的熠熠星光，聲嘶力竭，赴湯蹈火。但同時，一次又一次集體的愚昧、貪婪和暴力，不斷地摧毀着那美善之夢，使熠熠的明星晦闇失色。但是，當歷史的巨流滾滾而來，又涵湧而去，那些專制的君王、好戰的將軍，都隨歷史的浪捲流失無踪，而人類企求普世的和平、正義和愛的理想，却像晶瑩的寶石，永遠留在歷史的海灘上，閃耀着動人心魄的光芒。也正因爲這樣，二次戰後，世界的和平不但沒有取得保障，反而驅使人類面對着更具毀滅性的核子戰爭的陰影。這個現實，不但沒有使愛因斯坦——以及一切爲着全世界的永久和平而戰的人們——之美夢失色，反而益增人類爭取和平事業的決心。包括文學獎在內的諾貝爾獎的理想，雖乍見之下受到戰爭結構下現實世界一次又一次無情的打擊，却也在上述的意義上，於增進國際間的相互理解、寬容和善意的事業上，有了

一定的貢獻。

二、國際強權政治下的文學桂冠

諾貝爾文學獎，做爲一種獎金，和世界上其他各種各樣的獎金一樣，充滿了爭論。這是因爲執行獎金授與的瑞典學院，是不能不由一羣受到特定歷史、意識型態，甚至國際政治所影響和限制的人們所組成。一九〇一年，當第一屆諾貝爾文學獎頒給法國的蘇利——普魯東的時候，爲了獎金出乎意外地沒有授給至今爲全世界所公認的俄國大文豪列翁·托爾斯泰，引來全世界喧噪而強大的抗議的聲浪。一九〇二年諾貝爾委員會不得不提出一份答辯，終於說明了當時諾貝爾文學獎真實的思想立場。

如果僅是考慮到「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其他托翁的傑作，把這項文學競賽中的榮冠授與俄國的這位文豪，就比較容易了。然而，當我們考慮到他，其餘一些引起很大的騷動，叫人無法忽視其他複雜因素的作品，我們的決定，就很艱難了。

托爾斯泰對於那種否定了一切形式的文明，而且與一種更高文化的諸原則無緣的原始的生活樣式，大為讚美。他認為，不論什麼樣的政府，對於罪犯都沒有權利加以嚴重的懲處。尤有甚者，他甚至否定任何政府存在的權利，從而提倡無政府主義的思想。他對聖經的批評毫無所知，却基於他的一半是合理主義、一半是神秘主義，任意改寫聖經。此外，他斷然拒絕承認不論是個人或者國家，可以具有正當防衛的權利。對於他那種罕見於一切形式的文明中的狹隘和敵意，我們覺得無法忍受……。

委員會並且明白地指出托爾斯泰有關宗教、政治和社會的著作是「不成熟的」、「迷惑人心的」。事隔多年，委員會的申辯辭，徒然暴露了自己在文學上、思想上的鑑賞力和思考的深度，是如何受到典型十九世紀市民階層的庸俗、驕傲性格的限制。今天，表現在托翁文學作品和其他著作中深刻的人文主義精神，和托翁宗教理念中偉大的福音主義精神，已經受到普世越來越廣泛而真摯的敬仰。

事實上，任何熟悉世界文學史的人，還能舉出更

多為諾貝爾文學獎所「遺漏」的巨匠的名字：易卜生、康拉德、哈代、斯特林堡、高爾基、喬埃斯、普魯斯特、馬洛……等等。對於中國人，也可以舉出一兩個理應列籍受獎的偉大的中國作家。所幸，在文學的國度中，古今中外，自有法則。這些為諾貝爾文學獎所「遺漏」的大師，也自有他們輝煌萬丈的榮光，無需任何外加的褒獎來增加他們的榮耀，當然也絲毫不因不會列入受獎者中而遜色。然而，這些巨匠的「遺漏」，正好說明任何文學獎——即使諾貝爾文學獎也包括在內——只能增添原來自有的光榮，却無法製造原來所沒有的價值。當諾貝爾文學獎迅速地成為各為強國了增添自己在國際政治中的光榮的重要工具時，由謹慎、保守而力維中立的瑞典主持下，阿弗列德·諾貝爾原初的理想和願望，遭到愈來愈嚴重的困難。當我們回顧，授獎的檔案顯示了某種國際間的「配給」傾向。在世界大戰中，在國際強權政治下，任何挑剔的人都可以找到審慎而力求自保其「中立」的瑞典學院，是如何讓意識型態的好惡，以及國際政治的無可如何的壓力，滲透到文學桂冠的選擇。

三、爲真理與自由鞠躬盡瘁

如果對於諾貝爾文學獎給予過高、過大的評價是一項錯誤，那麼，對於它做過低或者過小的評價，也同樣是一項錯誤。事實是：當我們充分理解到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和授與背後整個錯綜複雜的秘辛，我們反而更能珍貴而不是蔑視這個文學獎。在國際強權的政治壓力下，在委員會成員各種歷史的、民族的，有關政治、社會、宗教的意識型態的限制下，諾貝爾文學獎固然沒有爲我們劃出一條無可爭議的、世界文學主流發展的實線，却也大致上劃出了一條虛線。八十年來，諾貝爾文學獎的金榜上，的確也刻下一長串輝煌的名字：

一九〇五年的顯克微支；
一九〇八年的奧遼；
一九一一年的梅特靈克，
一九一三年的泰戈爾；
一九一四年的羅曼羅蘭；
一九二一年的A·法朗士；
一九二三年的葉慈；

一九二五年的蕭伯納；
一九二七年的柏格森；
一九二九年的湯瑪斯·曼；
一九三〇年的辛克萊·劉易士；
一九三二年的高爾斯華綏；
一九三四年的皮藍德婁，
一九三六年的E·奧尼爾；
一九四六年的赫塞；
一九四七年的A·紀德；
一九四八年的T·S·艾略特；
一九四九年的福克納；
一九五七年的卡繆；
一九六二年的史坦貝克；
一九六四年的沙特；
一九六五年的蕭洛霍夫；
一九七一年的涅魯達……。

當然，任何人都可能依他自己的喜好，去重新排列和挑選這些名字。但無論如何，諾貝爾文學獎，在漫長的八十年中，在幕後複雜萬端的條件下，挑選了這些公認——或者爭議較少——的世界性的作家。無

可懷疑地，這些作家或者在思想的啓發上；或者在對人類和世界所懷抱的理想上，或者在文學表達的技巧上，或者在文學表現的遼闊可能性之探索上，都做出了偉大而令人感謝和敬仰的貢獻。在嚴酷的納粹支配下的法國，一邊戰鬥，一邊寫作，一九五七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卡繆，如此說道——

……在人生的各種境遇中——不論在隱晦或短暫的聲名中，或者在專制者的牢獄，或者能自由發表作品的時候，作家只能在鞠躬盡瘁地承愛爲真理服務和爲自由服務這兩項使他的作品成爲偉大的任務時，才能獲得億萬人民的心，並受到億萬人民的承認。因爲作家的職責，是在於團結大多數的人民。他的藝術不應該和一切的謊言和奴役妥協。因爲，不論謊言與奴役在什麼地方得勢，都會產生孤寂。不論我們個人的弱點是什麼，我們作品的高貴處，永遠是根植在兩項十分艱於遵守的誓約：對於我們明知之事絕不說謊，並且奮力去抵抗壓迫。

在這二十多年瘋狂的歷史中，在時代巨變裏，和我這一代其他的人們一樣絕望地迷失的我，

却一直受到這樣一個事實的支持：一種深藏於內心的情感，認爲在今天這樣時代裏寫作，是一種榮耀——因爲寫作是一種誓約——不僅僅祇是爲了寫作的誓約。尤其在審視着我自己的力量和存在的情境時，寫作，是一種和我共同活過同一個歷史時期的人們，一起忍受我們相同的悲慘和希望的誓約。這些人們，在第一次大戰時期降生，希特勒上台和第一個革命的徵兆正在開始的時候，他們正值二十歲上下的年紀；在西班牙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集中營的世界和充滿了酷刑拷打和囚禁的歐洲中，他們完成了他們的教育。正好是這些人，在今天，他們必須在一個爲核子武器所毀滅的威脅下的世界裏，生養子女，從事創作。對於這些人，我想，沒有一個人能要求他成爲一個樂觀主義者。我甚至認爲，我們應該去理解那些在極端絕望中，主張墮落和競相趨向於這時代的虛無主義的人們。但是，事實上，我們當中大部份的人，不論在我的國家、或者在整個歐洲，都拒絕了這種虛無主義，並且涉身從事人類正道的追求。他們必須爲自己鍛鍊出一種生活在

災難的時代所需的藝術，以便藉以重生，並且公開地和那在我們的歷史中起了作用的死亡的本能，做不懈的鬭爭。

卡繆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演說中說出來的這些語言，經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仍然在我們的心中引起蒼茫、悲痛的迴響。不，只要卡繆所說的謊言和奴役一日不從這人世中根除；只要刀劍一日還不能改鍛為耕犁，卡繆蒼沉的智慧和熾熱的人道主義精神，便一日仍是人類反省和指引的明證。

諾貝爾文學獎，便是由許多如卡繆這樣智慧的創造天才，譜成了獨特的系譜。平均地說來，世界上再也沒有一項文學獎能像諾貝爾文學獎一樣，歷史悠久，在爭論和衆說紛紜中，堅定地樹立起獨有的權威。此無他，因為諾貝爾文學獎的確將她的冠冕，授給了一些一世紀以來比較偉大的睿智、心靈和原創的才能。他們各自使他們的民族和國家得到榮耀，却也在受獎的一刻，成為全世界一切民族和人民共同的財產。

四、「諾貝爾文學獎全集」英文 版與日文版的特點和缺憾

正是爲了良好、有效地承受這一份二十世紀世界文學共同的遺產，一些先進國家，如美國和日本，都花費了很大的心力，用自己的語文，整理出版歷年諾貝爾文學獎全集，分別在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在美日問世。

英文版的全名“The Nobel Prize Library”（諾貝爾獎金庫），共二十冊，蒐羅有一九〇一年普魯東至一九七〇年索忍尼辛等六十六位得主的作品，同時附有木刻、得獎評語、評審經過、頒獎致辭、作品（有插圖）短評、及秘史，但可能顧及市場的考慮，或遷就每冊書的厚度，其中所選的作品，有些不是得獎作，例如依據瑞典學院對外公佈的資料，哈姆生的得獎作應是「土地的成長」，而該書選的是「饑餓」；赫塞的得獎作應是「玻璃珠遊戲」，而該書選的是「戴米安」（即「徬徨少年時」）和「克林梭的夏日」；邱吉爾的得獎作應是「英語民族史」，而該書選的是「我的早年生活」和「島國種族」；史坦貝克的得獎作應爲「悻悻的多天」，而該書選的是「相持」……等等。且有部分作品並非全譯本，例如蒙森的「羅馬史」、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雷

蒙特的「農夫們」、溫西特的「克利斯汀的一生」、湯瑪斯·曼的「布登勃魯克家族」、高爾斯華綏的「福賽特家史」、巴斯特納克的「齊瓦哥醫生」、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等皆是節錄本，以全集的標準而觀，顯然該書並不是個很理想的版本。

日文版的全文是「諾貝爾文學獎金全集」，係日本東京主婦之友社在諾貝爾基金會的贊助下，於一九七二年對外所發行的。共有二十六冊（另有一別冊，總共二十七冊），蒐羅有一九〇一年普魯東至一九七四年瑞典作家詹生與馬丁遜等七十二位得主的作品。同時仿照英文版，附有木刻、作家簽名筆跡（新增入）、評審經過、領獎致辭、作品（有插圖）、短評（或照英文版，或新增入）、年表（新增入，有的得主有，些有則無），主要的，其別冊還附有諾貝爾遺像、遺囑，得獎作家的評語、簡介和生活照片，諾貝爾小傳，諾貝爾財團及所屬機構，諾貝爾文學獎的創立及物理、化學、生理、醫學、和平獎簡介、款項，歷屆各項得主的名單，並附有索引，以上這些資料的羅列，有助於對諾貝爾獎的歷史背景更進一步的了解，足見編者在蒐集上下了一番工夫。雖然日文版所選的作品

與英文版不盡相同，但是前面所說的英文版的缺憾，在日文版仍然沒有改正過來，例如羅曼羅蘭的得獎作應是「約翰克利斯朵夫」，而該書選的是「高拉·布洛寧」、「彼得和露絲」、「愛和死的搏鬥」、「貝多芬傳」；巴斯特納克的得獎作應是「齊瓦哥醫生」，而該書選的是「巴斯特納克自傳」及其詩集；蕭洛霍夫的得獎作應是「靜靜的頓河」，而該書選的是「頓河的故事」；艾略特得獎前的代表作，應是「荒原」和其重要評論，而該書選的是詩劇「寺院的殺人者」；福克納得獎前的代表作，應是「聲音與憤怒」、「熊」，而該書選的是「軍餉」及一些短篇；貝克特的代表劇作，應是「等待果陀」，而該書選的是「終局」；索忍尼辛得獎前的代表作，應是「第一層地獄」，而該書選的是「伊凡·丹尼索維奇的一天」，和短篇小說「瑪特略娜之家」、「克利切托夫卡車站事件」、「爲公益」……凡此俱爲美中不足，十分遺憾。

比較了兩種版本的特點和缺憾之後，遠景出版事業公司在充分估量臺灣現有的人力和物力之後，決定在編輯體例上，做出這樣的決定：

一、既然英、日兩種版本，仍存有不少的不足和

缺憾，則將這兩種版本列為參考，站在中國的民族立場，運用現階段中國人的智慧和財力，來重新編纂，吸收英日版本的特長，補足或改進它們的闕失，使其意義不僅着眼於「橫的移植」，而且是向世界開窗，汲取歐風美雨，來滋養我們的文化根土。

二、對歷史負責，依據原始的文獻，力圖蒐羅得主的得獎作或代表作予以全譯和精譯，例如：

蒙森的「羅馬史」、班生的「超越人力之外」、米斯特拉爾的「米紹耶」、吉卜齡的「基姆」、海才的「悲壯」、霍普特曼的「黎明前」、「織工」、「異教徒」、哈姆生的「土地的成長」、法朗士的「波納爾之罪」、雷蒙特的「農夫們」、德蕾達的「母親」、溫西特的「克麗絲汀的一生」、湯瑪斯·曼的「布登勃魯克家族」、劉易士的「白彼特」、高爾斯華綏的「福賽特家史」、皮藍德婁的「尋找作者的六個角色」、奧尼爾的「奇異的插曲」、杜嘉德的「一九一四年之夏」、邱吉爾的「英語民族史」、史坦貝克的「悻悻的冬天」、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阿·斯杜里亞斯的「總統先生」、鮑爾的「九點半的彈子戲」、索爾貝婁的「奧吉馬金的奇遇」、以撒辛格的

「地產」……等等，這些都是每位得主的嘔心之作，也可說是二十世紀文學的精華，而且從未在國內翻譯過，此外尚補齊某些作家的年表，以呈現諾貝爾文學獎的全貌。

三、不高估諾貝爾文學獎，正如同不低估諾貝爾文學獎，將其擺置在適當地位，予以合理公允的評價，不盲從，不迷信，撥開國際強權操縱下政治勢利和人情冷暖的迷霧，以顯現諾貝爾文學獎的真貌。

五、齊手把中國文學推向嶄新的高峯

在台灣，三十年來社會和經濟的巨大發展，在文學上也有了相當的收穫。一種反省的思考，正在成長。在台灣的中國文學，是不是應該有更廣大、遼闊的視野，是不是應該有更縱深、豐富地思考這些問題，以日甚一日的問題性，提到全中國的作家面前來，要求他們嚴肅地正視這些問題。也就在這個時刻，有態度、有條件而且虛心地閱讀、研究二十世紀八十多年來，世界文學的心靈、智慧、和創造性所走過來的步驟，成為當前我們中國作家和讀者共同的迫切需要。